

学人雅趣

“过去的70多年里,没有一天不听音乐的。”年近85岁的化学家胡亚东笑着说。

尽管已是耄耋老人,可一谈到音乐,他就兴致勃勃,聊起了自己最喜欢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作品,“1959年初,经过近3月的奋战后,我造出了我国第一块氟橡胶。你可知不知道呀,我当时高兴地立刻跑回家,打开朝北的那扇窗户,对着窗外就开始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并且把声音放到了最大……”

的确,在胡亚东的生命里,音乐就是他的血液,让他的生命鲜活,光芒四射。

化学家的音乐情怀

□本报记者 杨新美

走进胡亚东先生的卧室,就能看到整面墙的柜子里有一半塞满了老唱片、磁带、CD,而在他的卧室的壁橱里,还有一个泛黄的书架,里面全部珍藏着他所收藏的正版音乐CD。除此之外,桌上还随意摆着数个MP4,他说,这里面也都存满了他最喜欢的音乐。

大家都说,胡亚东有着双重身份,不仅是一位化学家,还是一位音乐家。当他听到这个评价时,摆摆手笑着说:“自己不是什么音乐家,虽然学过点乐器,虽然会演奏,但也只是玩儿了一辈子的音乐而已。”

可别小瞧他所谓的“玩”,那可是玩出了点名堂的。他不仅只是听音乐,他还总是听完在自己特制的小卡片上记录下点滴的“听后感”;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享誉京城的专业乐评人,并写过一本名为《听,听,勃朗姆斯》的乐评书。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他,依然保持每天至少听1~2小时音乐的习惯。每天晚饭后,他就悠闲地躺在书房的躺椅上,手里转着两只核桃,两耳不听窗外事,只管塞上耳机就是听那些百听不厌的音乐。这已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说起胡亚东与音乐结缘的故事,就要回到70多年前。那年,十岁的他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从此,他渐渐喜欢上了音乐,开始听音乐,参加合唱团并在其中唱男高音,还跟着一位奥地利提琴家学了两年的小提琴。

1942年,年仅15岁的他还同几个

朋友组了一个四重奏团。其中,现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的杨儒怀当时曾担任大提琴手,杨儒怀的哥哥杨周怀担任中提琴手,胡亚东则担任小提琴手。他们这个四重奏团还参与了好几次公演。

如此痴迷音乐的他,在报考大学时,曾打算就此踏入音乐系大门,但一想到“玩音乐挣不到钱,难以维持生计”,于是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而选择了化学研究这条路。

胡亚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尽管后来是搞化学了,但同时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满足他对音乐的浓厚期望。这是因为后来的人生岁月,化学研究、玩音乐依旧并驾齐驱的同时,还互相影响着。

大学毕业后,胡亚东曾被派往苏联的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留学。他是第一批300多人的留苏人员之一,也是留洋学习高分子化学的第一人。正是到苏联后,胡亚东才意外发现“贝多芬不止9首交响曲,还有32首钢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奏鸣曲以及各种歌曲、歌剧”。他说,当时自己都惊呆了,兴奋极了。

为了狂补音乐课,4年留学生涯里,胡亚东每年都会提前买好音乐会年票,每月总要听上两三场,一年多达三十多场,如此,四年里就听了一百多场音乐会,几乎把前苏联有名演奏家的音乐会都听全了。

每到听音乐会的日子,晚上8点左右做完实验后,胡亚东就会满心欢喜地坐着电车去听晚上9点开始的、

长达2小时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他一般会还会喝点咖啡或者俄罗斯特色的荞麦粥再回家。直到零点才回到家中,凌晨1点钟睡觉,第二天一早接着去实验室。在那4年里,他总是坐在音乐厅里的同一个位置,因为去得次数多,“看门存衣的老太太都认识他了,存衣都不给他存衣牌,人多时,还优先照顾他”……

回忆起四年的留学生涯,他感叹道:“那是音乐大丰收的四年,是一段幸福时光啊!”而最幸福的莫过于,除了听了这一百余场音乐会,还收集到300多张音乐唱片。

但没想到的是,回国后遇上了“文革”,辛苦收集的唱片大部分都被没收了。“只剩下了我自己偷偷藏的几十张,但是那段日子,根本不敢听,完全不碰音乐了。”他摆摆手说。

尔后,再次有机会玩音乐就是1987年的事儿了。当时,胡亚东开始随研究所领导出国访问。只要是在国外,他就会找空闲去听音乐会,逛音像店买CD,甚至有一次用讲学获得的5000元酬劳买了50多张正版CD回国。迄今为止,他共买了2000多张CD。为此,他还特意制作了一份详细的目录单。

胡亚东总说自己只是喜欢音乐而



胡亚东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著名高分子化学家

玩音乐,其中自然也有不少趣事。

一次,胡亚东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出访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雅戈尔设宴招待代表团。在宴会中,胡亚东和雅戈尔闲聊起了音乐。令雅戈尔吃惊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竟然对犹太籍的音乐家了如指掌”。他小声告诉胡亚东,他一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问胡亚东有没有兴趣一起去……音乐让胡亚东后来与这位外交官成了至交。

“我听音乐听了有70多年了,要说音乐和科学有何直接关系是比较难说,但是间接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胡亚东说,“音乐不仅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理解力,还对为人处世、性格、修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不仅仅应该作埋头作研究,还应该培养对文史哲、艺术的兴趣爱好,因为科学毕竟只是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的一个枝丫。

书话岁月

柏林墙五十年

□徐迅雷



都知道柏林墙,但不一定知道它的正式名称——“反法西斯防卫墙”。

2011年8月13日,德国政府举行纪念柏林墙五十年活动。德国总统伍尔夫说,德国统一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德国人应该学会正确评价和保护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出生于前东德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献花悼念柏林墙死难者……柏林,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大都市,沧桑的历史,浓郁的文化。这里,宽阔的大街,巍峨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古典建筑 and 现代建筑相互映衬。

1961年8月13日之夜,东德——民主德国开始兴建柏林墙。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柏林墙其实也不是一夜就能建成的。柏林墙全长超过155公里,墙高约3米,沿墙建有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柱,108公里长的反汽车坦克冲击障碍……为了让这条隔离墙日益“完善”起来,东德花了好几年时间。把西柏林隔离开来的这一堵墙,与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一样,都是“后二战”的产物,成为冷战铁幕的象征。

英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所著的《柏林墙》一书,清晰地交代了直接原因:随着冷战局势日益严峻,西方大举援助西德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施行,再加上东德经济政策的失误,东德居民和西德居民在收入上的差距开始出现,于是出现了东德居民向西德逃亡的潮流;为了阻止大量东德居民,特别是熟练工人逃向西德,苏联和东德当局决定修建柏林墙。《柏林墙》一书交织着历史、原始档案和个人的故事,讲述了特定时期东西方主要政治领袖所处的特定场域、生存心态、惯习言行,以及这个分裂的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故事,告诉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曾经真实地降临在世人面前。

欲在东德土地上的西柏林,是苏联的眼中钉肉中刺。曾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任研究员、在中央情报局任职,亲历冷战全过程的雷蒙德·加特霍夫,后来写了本回忆录《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简明扼要地说清了更大的背景:柏林危机的高峰,始于1961年6月肯尼迪总统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首脑会

议上的激烈交锋,随后是8月竖起柏林墙,10月美苏坦克在一个边境检查站差点交火。从1958年到1962年,苏联领导人一直想搞掉西方在铁幕后面拥有的西柏林这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飞地。实际上,早在1948年至1949年,斯大林就曾封锁西柏林,当时的目的就是阻止西德的巩固,也逼迫西方退出西柏林,但未能得逞。赫鲁晓夫曾形象地将西柏林形容为“如鲠在喉”,不搞得它就难受。他企图使西柏林变成中立化的“自由城市”,让西方军事和政治力量都撤走。

柏林墙的正名称是“反法西斯防卫墙”,这是苏联与东德那些“命名大师”的“杰作”,其中关键词是两个“反法西斯”和“防卫”。在他们心目中,希特勒法西斯尽管在二战中被消灭了,但“西方”依然是“法西斯”,要“反”掉的,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墙的对面就是自由西方的“法西斯主义”,有侵略性,所以要“防”住的。其实柏林墙直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人的流动,就是人心的流动;人的流向,就是人心的向背的体现。东德和它背后的

学内外,为之不齿或寒心的大有人在。“如今泥塑沙龙沐猴而冠的所谓‘文学奖’,并不具备给中国文学以评价的资格……文学奖,在如今这个以不公平为特征的时代,经常是侮辱人心的工具。”著名作家张承志至今仍保持着直言无忌这一难能可贵的品格,此话听似尖刻和愤激,但足可为许多有成就但依然“正统”的作家代言。

文学奖本身并没有错,它总是心存善意的,也在总结和激励。作家张炜对此深有感触:“得奖,只说明评奖的人给予了你珍贵的鼓励,你应该感谢这鼓励,同时也要明白一切都要交给时间,要做得更好。只有行业里的傻子才会为某个奖赏去奋斗且沾沾自喜。心灵之业如果变成了摄影和体育赛事一类的东西,那就太廉价了。”但毋庸讳言的是,这样的“傻子”颇有层出不穷之势,且越来越在创作之外神通广大,也越来越把“奖”当作晋身之阶和名利之源,而丝毫不思付一下这“奖”“那”“奖”是否与自己名实相符。

1927年9月,当鲁迅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他当即拒绝道:“……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如此的不为所动,如此的硬气和警觉,如今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不断听说的是,为了评上某个“奖”而不断折腾的几近“文人无行”式的故事。但眼下在这扰攘攘之中,毕竟还不是为奖而全然忘了作家本分或责任的人。

从报上得知,天津女作家赵玫自从得了第一个鲁迅文学奖后,这些年她就不再申报任何奖项。原因有二,一是不愿因庸俗的“运作”而丧失了文学的真谛;二是远离尘嚣,她还愿写出更好的作品。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与信任,往往也就因此而起。

不由得想到了孙犁和杨绛,因为这一阵子对这两位作家说道较多,而说道中见得最多的是同道中人难以比肩的尊崇与感佩。孙犁是一位少有的真正纯正与纯粹的文学家,他从从不凭借与谋求文学以外的任何东西,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依靠的只是其自身深厚而独到的创作功力。而一贯安宁与淡泊的百岁老人杨绛则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由此看来,许多时候,不仅要有人人趋之如鹜或来路不明的这“奖”那“奖”之类视若浮云,还得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和境界。

展场速递

回望大明王朝

□本报记者 杨新美

政治腐败、王朝没落,这是大明万历朝;社会经济、文化艺术都空前繁荣,这也是万历朝。究竟是什么使得万历朝呈现两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或许,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能揭开这个谜题。

此次展览汇集了首都博物馆与十三陵特区明代万历朝文物的精华,展出了出土的200多件珍贵文物,涉及万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科技文化、书画艺术等方面,勾勒了明代万历年间全景式的社会画面,折射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将人们所熟悉的规律与结论在博物馆展览的叙事方式下重新审视。

一进入展览入口,就能看到张居正为教育年幼的皇帝而亲自编制的教材——《帝鉴图说》,透过这幅图和一旁的文字解说,

很快便能对“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窥得一斑。负责此次大展的首都博物馆业务研究部副研究员章文永介绍说,此次展览正是以这些万历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为切入,将展览分为“一位长期罢朝的皇帝”、“一个多彩的社会”、“一座豪华的帝陵”三大部分,并以“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形式,直观形象表现万历朝的方方面面。

此外,“有近50件文物是首都博物馆和北京昌平区十三陵特区首次对外展示。”北京十三陵特区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说。其中神宗的外祖父李伟夫墓及神宗妃嫔墓所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是首次展出,如皇后穿戴的“纱面棕帽”、“抹额”、“白玉佛字嵌宝石金簪”、“白玉革带”等文物。观众们可以结合展品所附的相关文献记载,形象直观地了解

万历朝外戚及宫闱的奢靡与淫逸。再如展品中有一个定陵出土的带柄金罐,表面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因长期熏黑而黑光发亮,侧面有“尚冠上用”铭文,底部有“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四钱”,这便是神宗生前煎药用的药罐。这一陪葬的药罐也是神宗一生体虚多病,经常服药的佐证。

此次展览由明朝历史的重要节点——万历朝来回望,审视整个明朝的发展脉络,也是对“明亡于万历”这一既有结论的又一次拷问。“展览只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让观众们在浏览万历朝四十八年的历史中,不仅是回望明朝,更是在博物馆的叙事方式中感知历史的兴亡和思考兴亡背后的种种因由。”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寅说,在博物馆中展示某一帝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文化尚属首次,我们不仅想作此尝试,更想在各类明代历史文化的传播与阐释方式中树立一种博物馆的范式。

“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十三陵特区共同举办这一特别展览,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黄雪寅说。今年正值首都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成立三十周年,两家文化单位在展示北京历史文化、推进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旅游文化发展上都具备了各自的优势和能力,本次展览的推出就是这种努力和实践的成果,更是双方深入合作的基础和开端。

第六届中国(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举办

本报讯8月14日,历时10天的第六届中国(长春)民间艺术博览会正式落下帷幕。展会共设展位2000个,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以及俄罗斯、韩国、越南、朝鲜、印度等多国艺术家参展。参展20多万件艺术品,涵盖瓷器、琉璃、石雕、珠宝、泥塑、玉雕、羊皮画、国画、文房四宝、龙泉宝剑等45大类,其中不乏各地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精品,例如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河南黄河澄泥砚等。

展会期间评选出了第六届长春民

品种最全的民间艺术精品、民俗文化产品博览会。展会共设展位2000个,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以及俄罗斯、韩国、越南、朝鲜、印度等多国艺术家参展。参展20多万件艺术品,涵盖瓷器、琉璃、石雕、珠宝、泥塑、玉雕、羊皮画、国画、文房四宝、龙泉宝剑等45大类,其中不乏各地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精品,例如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河南黄河澄泥砚等。

展会期间评选出了第六届长春民

博民间作品特等奖20名,从中将产生中国民间艺术最高奖“山花奖”工艺美术类入围作品,以及金奖49名,银奖50名,铜奖83名。同时组织实施了民间艺术精品展销展示、“山花奖”评选、中国民俗摄影展、国际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民间艺术大师研讨会、项目合作洽谈等10余项主题活动。此外,还开展了陶瓷、面部彩绘、泥人、剪纸、艺术品投资鉴赏等20多项辅助活动。(石明山)